

中外名人傳

（四十）

中外名人傳
編輯委員會編撰
王治平主編

敬請指教，歡迎投稿。（稿約見一三二頁）

溥儒（一八九六—一九六三）

皇孫博士
書畫大家

遜清皇孫家學淵源

溥儒，遜清貴胄，近代大畫家，畫風接近宋元，與張大千同享盛名，有「南張北溥」之稱。

溥儒，字心畬，號西山逸士。他的祖父就是晚清名臣恭親王奕訢，曾於咸豐、同治、光緒三朝身膺重寄。特別是在辛酉事變中，與慈禧太后合作，整肅顧命八大臣，協助慈禧奪權成功，種下清室衰敗的因子。光緒當朝時，內憂外患，強敵侵凌，慈禧西狩，奕訢留京忍辱負重，力退八國聯軍，名垂青史。溥儒是奕訢的嫡孫，道光皇帝的曾孫，宣統皇帝的從兄。

溥儒於一八九六年七月廿五日生於北京

，姓「愛新覺羅」的滿清王族。生而聰慧，英華外發，六歲啓蒙，曾窮究經史、文章，七歲能賦五言短句，十一歲下筆作文，詩文每為當時的宿儒所驚嘆。十二歲開始習大字，同時練習雙鉤古帖，他把家藏的晉、唐、宋、元的墨跡，一一取出，早晚研讀臨摹，自顏、柳、歐、蘇以至籀碑刻篆，無不臨摹殆盡，並習雙鉤多達數百字，所以他在書法上所下的功夫，非常深厚，遠比習畫的功夫深。他寫的行書，俊逸勁健，帶有飄逸之氣。又由於他曾苦讀古籍，故而寫詩也是才氣橫溢，他把自己的詩題在畫上，真是珠聯璧合，「詩、書、畫三絕大師」之名當之無愧。他自己曾對友人說：「他在藝術方面的才能，是畫不如詩，詩不如字，楷書不如行書，大字不如小字。」看過他寫在畫上字的人，都得承認這一點。

留德曾獲雙料博士

溥儒以畫享名，其實畫是他滿腹學問中

最弱的一環。十八歲時，他以貴胄考入清河大學堂習法政，畢業後赴德意志留學，畢業於柏林大學研究院，旋即返國省親，並遵親囑完婚，婚後，再赴德國，獲柏林大學天文學及生物學雙料博士學位，當時年才廿七歲。

讀古文史習畫自娛

溥儒學成回國後，滿清早已遜位，但他念及古禮垂訓：「禮，時為大」。湯武革命，順天應人。而孫文中山革命，亦是潮流所趨，他並不怨天尤人。但身為滿清貴胄，不能有損臣節，因而不想在國民政府之下為稻粱謀，而隱居於北京西郊馬鞍山的戒台寺，閉門讀書，沉潛書畫，苦讀近廿年。他在自傳裡說：「童年讀書，先從學庸入手，然後爾雅、說文，直到漢儒訓詁學，旁及諸子百家，而至詩和古文辭。」所以溥儒的國學素養，不亞於專業教授，題畫賦詩，用字遣辭，意境高遠，才華橫溢，詩風直逼李白、杜

甫。

由於治學精勤，作畫之外，尤勤於著作，已出版的有群經通義、四書精文集證、爾雅釋言經證、毛詩經證、唐五律佳句類苑、寒玉堂詩文集、論畫、論書等廿餘種，多為學子治學的工具書，嘉惠士林，影響深遠。

溥儒自承三十歲左右才開始習畫，最初純為消遣，由於他具有深厚的詩文基礎。又精通書法，詩書和畫是一脈的相通的，畫的根底，可作畫的基石，家中藏畫極多，他隨時觀賞，隨意臨摹。而他平日又喜愛大自然，經常親近山水，探幽尋勝，酣興林壑，涵泳既厚，渲染紙上，腕底別出機杼，與眾不同。這時，他臥讀西山，讀書早已破萬卷，所謂「腹有詩書氣自華」，作畫自是別具風格。因而廿年代，首次在北平與其妻推出雙人展，即轟動京奉藝境，令人驚嘆不已。不過溥儒具有中國讀書人的傳統觀念，始終視繪畫為文人譚興的餘事，治經史才是正途。

堅拒附敵大節凜然

藝壇出名之後，溥儒曾應聘執教北京師範大學及藝術專門學校。一九三一年，日寇侵華，佔我東北，扶植溥儀傀儡偽政權，曾對溥儒威迫利誘，促其歸附偽滿以壯聲勢，但他稱病堅拒，杜門不出，並發表文章「臣篇」以明志。七七事變後，日軍侵佔北平，溥儒更是不出戶，日酋捧鉅金登門造訪求畫，遭他當場拒絕，日酋留下鉅金自去，溥儒

派人送還，其愛國情操，高風亮節，愧煞附敵的漢奸們。

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溥儒當選滿族國大代表，參與制訂憲法，規劃民主憲政。一九四九年大陸陷共前，溥儒寄身杭州，中共有意拉攏他，派人接觸，他連夜逃至舟山，歷盡艱險，追隨政府來台。抵台後，身無分文，居陋巷，食粗糲，以鬻文賣書畫為生，大義凜然，令人肅然起敬。

畫格高遠風神雅韻

溥儒以畫享大名，被人視為大畫家，但他不大樂意被稱畫家或藝術家，他自認下功夫最深的是文史，成就最大的也是文史，這由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出。而他留德專攻的生物學及天文學，雖所知甚多，卻繳了白卷。其次，他自認詩作得不錯，字也寫得好，最後才是畫，可是他在畫上的名氣太大，已掩蓋了其他傑出的成就。

溥儒習畫師法古人，但不泥古，師法自然，但不照本宣科，他把古人筆法、大自然和現實融為一體，體悟其中的幽微，在紙上渲染出來。所以他的畫格調高遠，風神雅韻，韻致逸氣，筆筆出自性情趣味，筆筆自然流露。他說：「有師之畫易，無師之畫難，無師必自悟而後得，往往工妙，惟始學時難耳。」他說他畫無師承，全憑自悟而來，這說明他的才氣超群不凡。他的畫路很廣，山水、人物、鳥獸、蟲魚，無所不精，但主要

的還是山水。張大千讚揚他：「柔而能健，峭而能厚」，大家評論大家，當非溢美之辭。除畫而外，溥儒能詩能文，近人評他的詩：「古體宗漢魏，近體擅盛唐，以身經喪亂，蒼涼勃鬱，往往如杜少陵蜀中諸作。文則出入漢魏六朝，嚴謹闕肆，迭麗典則。」堪稱持平之論。

溥儒處世平易近人，藹然有長者風。教導學生，重視啟發與引導，務使其頓悟自悟，自創風格，不要走前人的老路。他教畫示範筆法，隨畫隨丟，學生多檢拾收集，片紙寸緒，視同拱璧，殆其身後，盡成珍品了。

溥儒於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八日病卒台北，享年六十八歲。參考中外雜誌：張目寒「溥心畹二三事」、陳頤「憶溥儒大師」、栗慶雄「溥儒趣談」。(王成聖撰)

高華德 (一九〇九—一九九八)

美國政治家
聯邦參議員

中華民國忠實友人

高華德 (Barry M. Goldwater) 一九〇九—一九九八) 美國政治家、聯邦參議員，一九六四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中華民國堅定的支持者。

高華德是美國重量級的政治領袖，畢生堅決反共，在其故鄉亞里桑納州的鳳凰城有

極高的人望，他於一九九八年五月廿九日病逝後，其靈柩於六月二日在他於一九一一年，兩歲時受洗的基督教堂舉行追思禮拜，有數百名亞里桑納州人擠進小小的教堂瞻仰其遺容，把小教堂擠得水洩不通。共和黨要員前副總統奎爾、雷根總統夫人南茜·雷根、前內政部長巴比特和我國特使錢復議長等位均出席了追思儀式。他的一位鄉親說：「他代表亞里桑納州過去的一切，他直言不諱，做事全憑良心，不怕得罪任何人。」高華德的靈柩在空軍儀隊護衛下，覆蓋國旗，然後安葬鳳凰城郊區墓園。

高華德對中華民國情深意厚，生前多次訪華，與老總統蔣中正、蔣故總統經國及李登輝總統都有深厚的私誼。晚年，曾坐輪椅來台北，記者問他來訪的目的，他笑著說：「沒有任何目的，這裡猶如我的家，很高興我又回家了。」近年來，中共改革開放後，曾多次邀他往訪大陸，均被他斷然拒絕。二次大戰期間，作為空軍教官的高華德曾在印緬戰區訓練我國飛行員，住過昆明，對於昆明的好山好水，十分懷念。但因不願和共產黨頭目打交道，直到死都不受邀約。早年，他曾要求美國政府，售我F十六高性能戰鬥機，一度把希望寄託在雷根身上，可惜雷根當選後，並未允諾他的要求，使他非常遺憾。因而後來對雷根頗有微辭。

高華德身高六呎有餘，除身材高大而外，他最引人注目的是經常打著繡有中華民國

國旗的領帶，他驕傲的對人說：「他擁有廿四條繡有中華民國國旗的領帶。」

一九七九年，卡特政府承認中共政權，我政府為保有華盛頓雙橡園大使館，曾以美金一元的價格售於中美友好協會高華德，美與中共正式建交後，他即把雙橡園無條件交還我駐美代表處，為我國保留住一份價值不菲的資產。

卡特政府與中共建交，片面撕毀「中美共同防衛條約」，高華德非常憤怒，曾向法院控告卡特政府，指其未經國會同意，毀約無效。最後官司雖告失敗，但他的義舉令人感動。斷交那天，我駐美大使沈劍虹黯然下旗離開華府，高華德趕到雙橡園與沈大使握別，宣稱：「今天是我美國歷史上一個悲哀的日子。」

鳳凰城的富家小開

高華德一九〇九年元旦生於鳳凰城，為猶太裔的美國人，其祖父為西征之淘金客，掘金致富，擁有連鎖百貨店十餘家，資財雄厚。一九二九年，其父病逝，當時高華德是亞利桑納大學二年級的學生，被迫棄學參與經營家族企業。一九三七年，正式全面接管

。二次大戰時期，他以備役軍官身分接受戰鬥機飛行訓練，隨即在鳳凰城郊的鹿克空軍基地任陸軍航空隊飛行教官。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被派來遠東，任印緬戰區美空軍飛行中隊長，曾駐紮昆明，協訓我國飛

行員，昆明的明山秀水，使高華德極為喜愛，中國空軍健兒熱情友善，和他建立了友誼，從而使他愛上中國，至死不渝。

戰後，高華德仍是空軍備役軍官，一九六二年晉階空軍少將，一九四九年當選鳳凰城市議員。一九五二年高華德於中央政壇初試啼聲，當選阿利桑納州聯邦參議員，並以極保守的政見在共和黨內建立灘頭陣地。他言辭犀利、辯才無礙，批評同屬共和黨的艾森豪總統的社會政策「如同民主黨」，而引起黨內溫和派與自由派的強烈不滿；共和黨大老討厭他，艾森豪嫌惡他，但他毫不在乎，他要落實共和黨「縮小聯邦權限、擴大地方州權」的傳統主張。他的保守主義，旗幟十分鮮明，五十年代初威斯康辛州共和黨聯邦參議員麥加錫隻手掀起風聲鶴唳的政治大動作，嚴厲打擊自由派與左派，造成美國政治史上最黑暗的時期，高華德則為麥加錫擊節叫好，令人側目。麥加錫後因行事踰越法度與情理，胡亂整肅無辜人士，觸犯參院規章而遭懲戒，當時只有二十二名參議員幫他說話，高華德即為其中一個。

一九六〇年，政治新秀甘迺迪崛起於民主黨，與聲望正隆的共和黨副總統尼克森爭奪總統寶座，尼克森竟告慘敗，退出政壇，共和黨群龍無首，雄心萬丈、野心勃勃的高華德趁勢而起，成為該黨最強力的領導人。一九六四年，高華德獲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擊潰黨內自由派重鎮、紐約州長洛克菲

勒及溫和派領袖、賓州州長史克蘭頓，而代表共和黨挑戰民主黨的詹森。由於高華德的極端保守主義、反民權、反少數民族和「剃刀邊緣」的高姿態外交政策，使選民對他敬而遠之。他大聲疾呼：「爲了維護自由而走極端，並不是罪惡；爲了追求正義而顯現溫和，亦非美德。」投票結果，詹森重創高華德，詹森贏了四十四個州，高華德僅在故鄉阿利桑納、密西西比、喬治亞、南卡羅林那、阿拉巴馬、路易西安那等六個州獲勝，選舉人票則爲四八六比五二，創下美國總統選舉史上差距最懸殊的空前紀錄。

美國保守主義巨擘

高華德的慘敗，使共和黨一蹶不振，連帶在國會選舉上也輸給民主黨，在參眾兩院的席次大幅滑落。但越戰擴大，國內反戰情緒高漲，民權運動風起雲湧，使詹森總統束手無策，予共和黨可乘之機。一九六八年美國總統大選，尼克森東山再起，實現了入主白宮美夢，高華德亦再次當選參議員，進入參議院，一直做到一九八六年退休爲止；連首次任期，總計當了三十年參議員，其間擔任過參院武裝部隊委員會主席，在參院頗受共和、民主兩黨同僚敬重。

高華德重返參院後，逐漸揚棄了激進保守主義的政見，思想慢慢開明了，不再像過去那樣極端，他變成了溫和的保守派，有些主張甚至顯得自由派。一九七四年水門事

件急轉直下，眾院司法委員會準備要彈劾尼克森，參院亦要跟進，國會山莊的共和黨大老知道尼克森的日子不多了，必須自動捲鋪蓋，否則必遭趕下台。共和黨乃推派高華德等三名大老專程到白宮告知尼克森「狂瀾已無可挽回」。七十年代末期，國會辯論巴拿馬運河是否應歸還給巴拿馬，保守派大加反對，唯獨高華德贊成歸還巴拿馬，受到保守派和孤立主義者的譴責。

就在高華德揮別極端的保守主義、「覺今是而昨非」之際，又一個右翼的保守主義者，聲勢越來越大，承續了正宗共和黨的香火，這個人就是當過八年加州州長的過去影星雷根。在尼克森、高華德、福特相繼淡出權力圈後，顯然只有口才便給的雷根能夠使日益式微的共和黨重振雄風。共和黨大老級人物不大看得起雷根，都在私底下罵他「一介戲子耳」；可是，這批大老卻沒有人具有他的本事，都無法像他一樣可以很清楚、很簡單地把保守派的觀點與主張向選民表達出來，使老嫗都能了解，這就是雷根最拿手的本領。

七十年代末美國社會漸趨保守、持重，在時代潮流的推進下，共和黨的雷根和布希當了十二年的總統，美國保守風氣依然未衰，柯林頓雖以民主黨之身主政，但他所推動的社會福利政策幾與共和黨無異，他也主張縮減聯邦權力、增加州權。可笑的是，從雷根、布希到今天的柯林頓，許多保守的作法

和施政，卻是三十餘年前高華德所大力傳播的觀念。

晚年思想大幅轉向

高華德晚年思想大變，觀念越來越像民主黨的自由派，他在鳳凰城頤養天年期間，不時開炮，針砭時政，他的攻擊目標竟是共和黨保守派。一九九三年柯林頓上台伊始即主張軍隊容納同性戀，軍方和衛道人士群起反對，高華德以備役空軍少將和前參院武裝部隊委員會主席身分發言支持柯林頓，他一語雙關地說：「軍隊何必硬性規定只收Straight（異性戀者），只要把槍打準（Straghty）就好。」高華德也贊成墮胎合法化，他對基督教右派的興起表示極爲厭惡。

高華德的「越來越左」，惹火了共和黨保守派分子，揚言要將以他爲名的街道、學校統統改名。三十多年前，極右的高華德使共和黨開明派感到難堪；三十多年後，「大澈大悟」的高華德卻讓共和黨保守派跳腳，直到辭世，仍令人錯愕不已。

與我黨政領袖交厚

高華德於一九六七年來台，與當時的國防部長蔣經國促膝長談，並由空軍總司令徐煥昇陪同訪問台中清泉崗空軍基地，接受中國空軍贈勳。一九七五年，老總統蔣中正去世，他曾來台親自參加奉厝大典。高華德熱情大度、強烈支持台灣，每隔幾年就會來台

訪友，輔仁大學曾授予名譽法學博士學位。一九八四年五月，參謀總長郝柏村訪美洽談軍購，在華府四季飯店設宴時，高華德亦應邀出席並致詞。

卡特政府與北京建交後，決定廢除華府與台北的諸項條約，其中包括維護台海安全極具作用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高華德興訟於法庭，有十四位國會議員連署，官司打到最高法院，高華德的控案終遭駁回。但對我國的關愛和友誼，令人有「風雨故人來」的溫馨之感。

高華德留有遺著三本：「保守者的覺醒」(Conscience of Conservative)，於一九六〇年出版。「為什麼不勝？」(Why Not Victory?)，一九六二年出版。「我在何處」(Where I Stand)一九六四年出版。(劉達人撰)

費景漢(一九二三—一九九六)

中央研究院院士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

台灣大學教授

專長經濟發展理論

費景漢，著名的經濟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畢生致力經濟學學術研究及教學，曾任教於美國哈佛、耶魯及康乃爾等名校。在台灣曾講學於台灣大學、東吳大學等。著述甚

豐，專長經濟發展理論，在「剩餘勞力」及「雙元經濟」方面有獨創的見解，對開發中國家農工勞力移動、資本形成及技術更新有精深的研究。另對中國經濟史亦曾著力甚勤，積稿盈尺，尚待整理付梓。

費景漢於一九二三年三月十一日生於北平市，青少年時期一直在北京讀書，對故都風物極為熟悉，談起來如數家珍。後來進入燕京大學經濟系，進大學之前，費景漢自認不知天高地厚，在父母羽翼下，無憂無慮，玩樂的興趣遠高於讀書。直到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變後，他正在燕大讀二年級，日軍突然包圍了這所美國教會大學，限學生於廿四小時內離校。當時北平的其他十所大學早已遷往內地，燕大是留在北平城唯一的大學。日軍突來的限令，使他不知所措，只好拾起書本回家。後來燕大在成都復校。費景漢聞訊和姐姐由北平逃出，歷盡艱險，到達成都復學。可是，此時的他已失去護翼，只有靠自己，使他猛然省悟，需要好好的讀書了。

進大學走的是後門

費景漢曾自述，他在少年時代，頑皮好動，不喜讀書，中學時代功課不好，到了高三，面臨升學壓力。那時大陸上的大學有兩個教育系統：國立大學和教會大學。而燕京大學算得上是當時最好的教會大學，非常難考，幸好他父親是校長的好朋友，因此得以

走後門由育英中學保送燕大，進入經濟系就讀。

一九四五年，對日抗戰勝利，費景漢亦自燕大畢業，獲經濟學學士，自認讀了點書，滿腹雄心壯志，投考當時全國惟一的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結果名落孫山。接著，勝利復員到上海，爲了生活只好謀職，在上海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謀得一職，工作之餘，積極準備出國留學。一九三七年申請到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隨即負笈美國，不料一去就是數十寒暑。

初到西雅圖，寄寓他鄉的孤零感，使他感到前途茫茫；而後大陸陷共政府遷臺，隻身在外的費景漢，益發覺得毫無希望，只得將心思完全放在書本上。他寄住的家門口對面，有間學生電影院，在華盛頓大學的三年間，他一次也沒有進去過，每天扣除上課、吃飯、睡覺，所有的時間全泡在圖書館裏，生活除了讀書還是讀書。後來以最優異的成績畢業，系主任建議他轉到更好的學校去，於是，進入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研究所繼續深造，受教於當代經濟大師山繆爾森教授(Samuelson)門下。於一九五〇年獲碩士學位，兩年後獲博士學位，成爲華盛頓大學第二位拿到博士學位的學生。第一位是曾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克萊恩(Klein)。

窮究數理經濟課程

獲博士學位時，費景漢才廿九歲，隨即

在麻省理工學院擔任講師，並在哈佛大學擔任經濟計畫研究員。工作之餘，仍覺學有不足，欲從事更高深的研究。他的老師梭羅（Robert Solow）告訴他：「經濟發展是一項很有希望的學問。」他自己也知道約在兩百年前經濟學萌芽時，古典主義曾提到經濟發展，一八二〇年以後，經濟學家們不再講經濟發展，所以，西方的經濟學家約有一百二十年的時間未曾注意經濟發展問題，直到第二次大戰，整個經濟學性質改變了。原本沒有所謂的「數理經濟」，如果只講數學，還跟經濟學扯不上關係，二次大戰後，經濟學變質了——數理化；如數理經濟、數理統計等，這些都是大戰後才有的。因此，諾貝爾獎除了物理、化學，在人文科學中就只給經濟學。當時他就瞧出不對勁了。可是他的數理底子太差，但他有一種感覺：非念好數學不可。幸而暑假期間有位數學系的中國同學義務教他微積分，就在那個暑假，他把所有微積分書上的題目都做過一遍，終於弄懂了這門基礎數學。爾後，他一邊念經濟，一邊修習數學課程，一直到博士班畢業，總共選修了二十門之多的數學課程。

巴基斯坦印証實務

深具理論的費景漢極思有實務驗證，但他只是俄亥俄州一所小型大學安條克學院（Antioch College）的教授，沒有機會從事經濟實務。一九五三年適巧由福特基金會出資，

邀請美國各大學教授幫助巴基斯坦政府形成經濟發展政策的計畫，他參與了這項計畫，實地到巴基斯坦協助當地政府研擬經濟計畫，同時訓練人才。使他在一年半之內，從事理論與實務的印証工作。一九六〇年代初期，費景漢自巴基斯坦返美，隨即進入耶魯大學任教，而根據巴基斯坦的實際經驗，撰寫了許多文章，其中稱得上是他在經濟發展學理上一項重要貢獻的「勞工剩餘雙元性經濟發展理論」，也就是在此時發展出來。不過理論才剛成型，他就到康乃爾大學任職，那時正好李登輝總統與劉泰英、毛育剛等現在國內的名人都在康乃爾唸書，因此他們自然就成為費景漢教授這套經濟成長理論的首批學生。這是費景漢與中華民國恢復往來的開始。

而也就因為對經濟發展理論研究的興趣與執著，三年後，當費景漢再度回到耶魯大學擔任終身教職時，便更積極地申請計畫，走訪東南亞國家，實地探訪開發中國家所面臨的轉型問題。那時在台灣幫費景漢進行研究計畫的有台大國際企業系教授邊裕淵、中研院社科所研究員曹添旺等人，而那時的台灣政府為了形成經濟政策，正好也以財經部會首長為主體，組成一個五人小組（當時成員包括俞國華、孫運璿、李國鼎、費驊與張繼正），同時找來劉大中、蔣碩傑、顧應昌、邢慕實與費景漢等人擔任非正式顧問團。費景漢除學術研究外與台灣經濟發展政策實

際發生關係的開端，也就起始於此。

費景漢於一九五八年冬天回到華盛頓大學任教，一九六二年轉任耶魯大學副教授，一九六五年擔任康乃爾大學講座教授，一九六九年以後改任耶魯大學教授，一九八二年改任榮譽教授，其間曾多次利用休假回國講學，於台大及東吳大學授課，春風化雨，作育中外英才。

一九七二年，費景漢以經濟發展理論卓越的學術成就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但在一九六二年即發現台灣突然忙了起來，一九六五年美國名經濟學教授庫茲耐特（Simon Kuznets）來台訪問，也發現了這一現象，但卻無法解釋。費景漢受到啟示，就以國際貿易開放性經濟模型，修正他原先在「封閉性經濟」體系下發展出來的理論架構，並發表「勞工剩餘開放雙元性經濟發展理論」，同時他對台灣過去的經濟發展歷程，以一九六二年為界，提出了在此之前為入口取代，之後為出口導向時期的斷代性的認識。有趣的是這項台灣經濟發展時期的分類，目前經常被引用，但大家可能都不知道，當年這卻是費景漢第一個提出的。

蔣王論戰捲入漩渦

費景漢與台灣的關係就是以學術與政策研究為兩大支柱，進行了十多年，直到一九八〇年，繼蔣碩傑任台灣經濟研究所所長，蔣氏轉任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蔣、費兩氏

經常對國家經濟政策獻言，已成為有影響力的。八〇年代初期，國內經濟學界爆發蔣王論戰，費景漢也捲入漩渦，不過他和蔣碩傑同一陣線，與王作榮辯論。簡單的說，這是一場自由化、國際化制度與政策的論戰，蔣碩傑是主張政府不應當再用政策干預市場，尤其不應當以印鈔票，增加貨幣供給，並透過銀行收款給企業家，幫他們賺錢，因此他批評政府靠印鈔票幫助企業賺錢的合法盜竊行為，好比是「五鬼搬運」、「金蟬脫殼」。但是蔣的原意無非是希望政府從管轄人民的市場中撤退，是制度與學理上的質疑，絕非是罵企業家，而且事實上對於一個相信自由主義的人，他對企業家精神與市場機能的肯定，實遠超過他對政府萬能的信賴，然而當時的企業家卻誤解了。

費景漢基於同為自由主義的支持者，很希望能化解在這場制度之辯論中，企業家對蔣的誤解。不過在後來的一場公開辯論座談會上，費氏原本希望藉由「當今的企業家大部分是白手起家」的演說詞，達到讚許國內企業家奮鬥精神的目的，但卻意外地引起出席的大企業代表立即的反彈，說他們不是「白手起家」。費氏事後回想這件事，才恍然大悟，原來問題出在這些企業家原先就已對蔣氏的「五鬼搬運」、「金蟬脫殼」產生誤解，以為是在譏諷他們偷東西，後來再加上他這一句「白手起家」，豈不雪上加霜，好話成為壞話，這種誤會，當時無法得到溝通

化解，放在心中多年，實在覺得委屈。不過這場論戰之後，費景漢與另一方的主力戰將王作榮，取得了共識，同時也成了好朋友。

研究大陸經濟發展

一九九三年，費景漢繼蔣碩傑擔任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決定長住國內，把自己的專長奉獻給國家。不久，由總統聘為國策顧問。他在中央研究院以學術質詢委員的身分，對經濟及社會科學兩研究所做學術指導，獎掖後進。同時他的合作研究範圍，不限經濟發展兼及中國經濟史。一九七八年，中國大陸開始進行制度改革，共產國家制度演化的研究深深吸引著他，而他對經濟發展學的理論研究重心也開始慢慢轉移到大陸問題上。

一九八三年，他正式在耶魯大學教授大陸經濟發展的課程。而大約就在這個時期前後，在大陸極為活躍的鄒至莊，很想組成一個小組，幫助大陸進行經濟改革，於是就找了蔣碩傑、費景漢、顧應昌、劉遵義等院士共同研究大陸經改問題，而費氏那時也同時接受了世界銀行的邀請，為大陸方面改編教科書。一九八六年，趙紫陽請這些院士吃飯，他們看到大陸的經改，心中充滿希望；但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後，這些學者對大陸的看法也分為兩派，一是認為應該仍繼續前往大陸協助中共進行改革，這派學者以鄒、劉為主，認為有經驗的人如果不去，大

陸的改革只會更慢；不過另外一派，基於對中共蔑視人權的抗議，事件發生後即停止與大陸的往來，這派學者則以費景漢為代表。

然而費氏在天安門事件後，雖沒有再去大陸，同時也辭去世界銀行委託的職務，但是他對社會主義解體後，大陸要如何一邊習慣市場經濟的運作體系，一邊又得學習透過金融、財政政策工具管理市場的演變，發生極為濃厚的學術研究興趣。費景漢表示，這種社會主義國家的制度演變，在經濟發展的理論研究中是一個新興的領域，非常值得學者研究。

費景漢於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任內，曾領導一個小組對大陸經改制度作學術的研究，並希望由經濟觀點，對中共倡導的「一國兩制」尋求答案。對此項研究，他喜形於色，曾對學生說：「我最近幾年研究性質改變，從前我的數理經濟很好，不過，現在改念中國經濟史、中共經濟史，專事如何從共產計畫經濟制度轉變成自由市場經濟制度的研究。這是現在最新的學問。」

可是正當他孜孜兀兀，致力研究之際，竟於一九九六年七月十九日因心臟衰竭病逝台北寓所，享年七十四歲。

費景漢的雙親都是早期的留美學生，父親從商，母為虔誠的基督徒，有兩兄三姐一妹，他排行第六，兄弟都受美國教育。費氏曾結婚兩次，先娶盛氏，後與張立和結婚，育有三男：費星成、費波成、費漢成，都攻

電腦，學有專長，貢獻社會，受人愛重。（龔祖遂撰）

伯納杜（一八九五—一九四八）

中東以阿和平的奠基人

伯納杜（E. Bernadotte）國際人道主義者，瑞典王室伯爵，國際紅十字會會長，聯合國中東特使，卻在中東遇刺身死。

伯納杜生於一八九五年，為瑞典王室一員，封韋士堡伯爵（Count Wisborg），自幼受宮廷教育，但作風平民化，早期活躍於瑞典政壇，為維護平民權益仗義執言，在瑞典甚得人心。但他的享名國際，則始於二次世界大戰。二次大戰時，歐洲兵連禍結，烽火遍地，但德軍及英法俄軍在戰爭期中，均有許多士兵被俘，備受虐待。具有悲天憫人心懷的伯納杜奔走呼號，促成雙方換俘。他自任瑞典紅十字會會長，奔走柏林、倫敦與莫斯科之間，力促交換戰俘。在他的安排之下，有十多萬傷兵戰俘，經交換各回本國，受到較佳的照顧與治療。這一人道行動，使伯納杜聲名大噪，揚名國際，而成為國際紅十字會的中心人物。一九四六年，二次大戰結束，伯納杜在瑞典的聲望達於顛峰，膺選國際紅十字會會長，協助戰後流離失所的人民，重返家園，成了苦難人民的救星。

一九四八年初，中東爆發戰爭，以色列為爭取建國，和阿拉伯諸鄰國為爭奪巴勒斯坦

坦而發生軍事衝突，伯納杜以國際紅十字會會長的身分，由聯合國選派為中東特使，斡旋以阿衝突，他奔波於雙方佔領區，安排和平條件。他遵照聯合國決議，把巴勒斯坦分成兩個部分，一部分由猶太人治理，建立以色列國。一部分由阿拉伯人統治。耶路撒冷由聯合國託管。此議猶太人同意，但阿拉伯人拒絕，誓言消滅以色列。伯納杜試圖緩和阿拉伯人的反對，極力勸說，都激怒了阿拉伯極端份子，而在他行經耶路撒冷以軍佔領區時，突遭槍擊，當場喪生，年僅五十二歲。

彭克（一九〇四—一九七四）

中東以阿和平的締造者

彭克（Johnson R. Bunche）美國黑人政治家、殖民地專家、聯合國中東和平特使，一九五〇年獲諾貝爾和平獎。

彭克於一九〇四年生於底特律，一九二七年畢業於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一九三四年獲哈佛大學法學博士學位，其後又在倫敦及南非從事學術研究。外交生涯開始於一九四四年，進入美國國務院擔任顧問，參與九國國際會議，討論殖民地問題。一九四六年，聯合國成立，彭克是聯合國組織制度的策

畫人之一，憑其深厚的法學素養，為聯合國的組織架構打下基礎。聯合國成立後，出任聯合國秘書處託管理事會主席，專門處理有糾紛的託管領土，協助許多弱小國家獨立，深獲好評。一九五五年升任聯合國副秘書長，協助秘書長哈瑪紹安定國際秩序。

一九四九年，彭克因在創建聯合國組織架構方面貢獻卓越，獲諾貝爾和平獎，是黑人獲此獎的第一人。一九四七年，他曾追隨伯納杜至中東，調解以阿衝突。一九五〇年五月伯納杜遇刺喪生後，聯合國即指派彭克繼續執行伯納杜未完成的任務。當時正值第二次大戰後，猶太人回到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國，成為猶太人歸屬的中心。但巴勒斯坦是阿拉伯人的家園逾一千三百年，阿拉伯領袖立誓要收回巴勒斯坦，重建家園，雙方發生激烈戰鬥，而國際勢力又暗中介入。當時為兩元世界，西方超強的美國，幫助猶太人。而蘇聯則幫助阿拉伯人。兩元對峙，巴勒斯坦宛如火藥庫，第三次世界大戰一觸即發，伯納杜到中東後，倡議把巴勒斯坦分割為二，約旦河以東屬以色列，約旦河以西及加薩等地屬阿拉伯人，聖城耶路撒冷為回教及猶太教的信仰聖地，由聯合國託管。這個構想，經伯納杜及彭克多次奔波磋商，始告完成，但遭阿拉伯人拒絕，接著，以阿發生五次戰爭，造成許多難民，彭克於伯納杜遇刺身亡後，即獨負艱鉅，折衝尊俎。

一九四九年，彭克獲授史皮拉恩獎章（

Spingarn Medal)，此一獎章專門頒給有色人種的傑出人物。彭克於公職退休後，即回到哈佛大學執教，於一九七四年病逝。（丁慰慈撰）

蔣緯國（一九一六—一九九七）

生於上海身世如謎

蔣緯國為先總統蔣中正之次子，浙江奉化人，曾留學德國研習軍事，專攻山地兵作戰。二次大戰後轉往美國，入美國陸軍航空學校受訓，畢業後又入裝甲兵中心學習，回國後服務裝甲兵，曾任裝甲兵旅長、司令，晉陞至陸軍二級上將。但他瀟灑不羈，不擅官場文化，一生起起伏伏，備受爭議。

蔣緯國於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五月十六日生於上海，為蔣公中正的次公子，但他的身世如謎，他曾自述其生父為革命先烈戴季陶，母親是戴季陶留日時的女友，重松金子。過繼蔣公後，國父孫中山先生親自為蔣故總統經國、蔣緯國、戴季陶之子戴安國、革命先烈金誦盤之子金定國命名，取其「經緯安定則世界大同」之意。

蔣緯國出生後，隨蔣中正及姚冶誠女士住上海，並以姚冶誠為母，畢生侍之為母，而姚待之一如己出。一九二〇年，蔣緯國遷居蔣氏故居浙江奉化，進入奉化幼稚園識字啟蒙。八歲時到廣東，隨當時任黃埔陸軍軍

官學校校長兼粵軍參謀長的父親蔣中正走入黃埔軍校，首次接觸軍事。一九二八年回上海，進入東吳大學附中就讀，一九三四年畢業，考取陸軍官校第十期，上海交通大學及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均因病未能入學，轉而就讀東吳大學理學院，修畢物理系的全部課程，一九三六年轉入東吳大學文學院，攻讀政治學及經濟學，以期成為文理全才。

赴德留學入伍德軍

一九三六年冬，蔣緯國奉父命赴德國留學，研習軍事，先入柏林大學修習德文，翌年，中國兵學權威蔣百里訪德，蔣緯國擔任其少尉侍從官。隨後到德國第七軍團入伍，做七軍團司令官封·萊謝勞將軍（GEN. F. VON REICHENAU）幕賓，先後在二位中外

名將左右，獲得直接傳授。翌年在德國山地兵師第九十八團再度入伍，自二等兵實習至班、排長及教導連連長。入伍時獲特級射手榮譽帶及器械操與單臂舉重全團第一。完成入伍訓練後，進入德國陸軍慕尼黑（MÜNCHEN）官校研習。畢業後任德國陸軍山地兵少尉，此一期間曾參加德奧合併及進佔捷克之蘇德頓區（SUDETENLAND）戰役，戰後獲德國十字勳章。

一九三九年歐戰爆發，德國與日、意組成軸心國聯盟，蔣緯國奉命離德轉往美國，進入裝甲兵中心學習，協助美軍成立第一個裝甲兵師。次年十一月，返抵陪都重慶，遂

即參加抗日戰爭。在重慶時，首次與繼母宋美齡見面。旋即赴西安向卅四集團軍報到，任裝甲兵團連長，不久，即參加黃河及潼關防禦作戰，親自開槍擊中日機一架。以後又在魯西及豫東參加對日作戰，不避險阻。

升任裝甲兵副司令

抗戰勝利後，升任裝甲兵司令上校參謀長，一九四八年底率部在徐州剿共，參加徐蚌會戰，對抗共軍。一九四九年來台後任裝甲兵上校副司令，不久，裝甲兵四萬兩千人的兵力，縮編成一個獨立旅，蔣緯國升任少將旅長，年才卅四歲。

以後，蔣緯國又受命在台中籌設裝甲兵訓練基地，開始訓練幹部，重整裝甲部隊，並親率裝甲單位戍守金廈。一九五三年入美國陸軍指參學院正規班及防空學校飛彈班受訓；利用週末學習飛行，獲美國民用飛行執照。在國內他亦曾歷受完整之軍事及政治作戰教育。一九七二年獲大韓民國慶熙大學榮譽法學博士；翌年獲授中華學術院哲士，並為永久教授。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三日美國聯合大學太平洋學院授予榮譽院士，並頒給榮譽人文學博士學位。

湖口兵變影響升遷

以蔣緯國的家世背景，加上他的學識才能、儀態英挺，在軍中快速升遷，被視為理所當然，然而他卻於一九五四年由美國陸軍

指參學院正規班受訓期滿回國後，調任國防部高參室第五組高參，等於打入冷凍庫，直到一九六二年元月一日再調任裝甲兵司令才算解凍，晉升中將。這對四十五歲的蔣緯國而言，前程發展時猶未晚。可惜在他調任陸軍指揮參謀學校校長的第廿一天，也就是在一九六四年元月廿一日，駐湖口的裝甲兵部隊發生兵變，由副司令趙志華少將主導叛變，變亂迅被收平，但趙志華係蔣緯國保舉，此案對蔣緯國的軍事影響甚大。趙志華的軍人經歷和蔣緯國息息相關。在剿共時期，趙志華在徐州接替蔣緯國任戰車第三團團長，配合湯恩伯部隊參加上海保衛戰，後來趙志華被俘，脫困後來台，在蔣緯國的力保下，趙志華未被調查而恢復原職。

而蔣緯國在裝甲司令任內也與趙志華的交往最好，兩人默契絕佳，讓外界認為蔣緯國對湖口兵變有其間接關連。

最後在蔣中正親自開口向蔣緯國說「他對部屬識人不夠」之後，這個微妙的變化和轉折，在蔣緯國心中起了變化。

也由於這個事件的影響，蔣緯國從此離開了軍令系統，在軍事教育一待十八年，這十八年他一直是個中將，為奠定國軍的軍事教育而努力。

也因為這個事件原本軍人前途順利的蔣緯國，卅四歲升少將，四十五歲升中將，等到五十九歲屆齡前，才晉升上將，這段路走得是相當長久。

自一九六四年開始，蔣緯國以陸軍指參學院院長身分，執行其父蔣中正的命令，為三軍將校準備戰略教育，並重編國民革命軍戰史、中國歷代戰爭史。經五年之積極籌畫及訓練教官，於一九六九年創設戰爭學院，召訓將校，他親自主講重要戰略課程，奠定國軍完整戰略教育的基礎。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六日晉階陸軍二級上將調任三軍大學校長，兼任戰爭學院院長。一九八〇年四月七日調任聯勤總司令。

任國防會議秘書長

一九八四年蔣緯國調任國防部聯訓部主任，是年年中其兄蔣經國先生當選第七任總統，李登輝為副總統，蔣緯國調任為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以二級上將軍階退役。一九九三年卸職，被聘為總統府資政，仍以光復大陸及統一全中國為職志。而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一職，屬於權力中心，外界揣測他將扮演「監國」的重要角色。因而當時依憲法仍由國民大會進行總統選舉時，部分資深國代有意推舉他爭取黨副主席，甚而總統職位。

一九八八年，蔣故總統經國逝世，部分資深國代支持蔣緯國出任國民黨中常委或副主席，惟缺乏名分與有力聲援，無疾而終，後來李登輝當選主席仍聘他為中評委主席團主席；兩年後，部分資深國代又推舉他與前總統府資政林洋港搭配參選正、副總統，但

在八位黨國大老的勸退下，旋即辭選。

不論是在湖口事件中，無端受到牽累，抑或是一九九〇年「二月政爭」中，被部分國代推舉為「候選而不競選」的總統參選人，蔣緯國始終無法對自己做主，應顯了他的宿命性格。

槍械事件飽受打擊

強烈的無力感再加上老年衰病，使晚年的蔣緯國對政權遞演及政局發展，逐漸產生厭煩與不安，並使他與最高主政者漸行漸遠，成為黨內的非主流，一九九一年六月，台中市警局在私立宜寧中學蔣緯國別墅中，查獲六十支口徑點二二的練習靶槍，別墅女傭在案發後跳水塔自殺，頓使「蔣緯國私藏軍火」成為社會談論焦點，並必須面對法律。

這件「擁槍案」是台中市警局於私立宜寧中學，蔣緯國卅坪不到的別墅裡找出來的，由於當時蔣緯國為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在台中警方的低調處理下，外界根本不知有此事。

不過，由於台中街坊已流傳著「蔣緯國別墅藏有大批軍火」，管理別墅的女傭李洪美，也是蔣緯國前李姓侍衛之妻，居然於六月卅日在中市大慶街的一處水塔上，從高處跳下自殺身亡，雖這起自殺案家屬沒有任何意見，且從蔣緯國別墅槍枝被查獲，但包括宜寧中學與許多人都不知道有「槍枝」的事實下，警方何以得知，李洪美為什麼要自殺

，都透露了不尋常的氣氛。尤其是年七月五日由民進黨立委葉菊蘭舉發這件「私藏軍火」案，使整個事件成為全國注目的焦點下，似乎另一場的政治風暴又要展開。

經過台中市檢方和調查單位深入調查，全案是在同年十月十七日偵結，由於包槍枝的舊報紙都已廿多年，檢方認定可以證明當年已贈給宜寧中學，終止其支配，縱有刑責也過了法定的追訴時效，最後是以不起訴處分收場。

不過，從蔣緯國捲入政爭失利，隨即有在野黨舉發其「擁槍自重」，加上台北市市政府強制要求取回其在台北市的別墅土地等一連串事故，都直接衝向蔣緯國而來，讓他愈來愈離開政治核心。

要求移靈被指找碴

一九九二年，蔣緯國離開公職，曾應邀訪俄，返國後即動胸腔大手術，身體日衰。一九九六年七月，蔣緯國突在國民黨內提案要求兩蔣移靈大陸，提出的理由是台灣當前對兩位蔣總統不夠尊重，陵寢隨時有被突擊的可能，建議黨中央成立故總統籌劃奉安移靈事宜。

蔣緯國的建議案，雖代表蔣家家屬的心願，但黨內主流派多少認為他特意找碴，因為以現階段兩岸間的關係，移靈回大陸如同天方夜譚，何況蔣經國兒子蔣孝勇當時也有

不同的主張，對於蔣緯國的建議，國民黨成立了奉安專案研究小組，最後由國民黨中常會通過「兩階段」奉安案，意即先國葬於台灣，待兩岸統一後再移靈奉安於大陸，而移靈案也轉交總統府和行政院組成奉安籌備會，準備國葬事宜。

兩蔣移靈案當初在國民黨喧嚷一時，當權覺得兩蔣移靈之事是燙手山芋，能不碰就不碰。當初蔣緯國的提案靠著黨內大老蔣彥士居間斡旋奔走，才讓事件風波平息下來。而總統府資政蔣彥士不久也從中常委轉為中評委，離開黨內權力核心，沒有了推動的手，兩蔣要國葬恐怕還要一大段時間。

蔣緯國歷任尉、校、將級正副部隊長及幕僚長、教官，退役後更受聘民間大學，為碩博士論文指導教授，平日他出語幽默風趣，平易近人，又風度翩翩，不僅廣受三軍袍澤敬愛，亦普受民間友人歡迎。他曾任美生會中國總會會長，並為臺北扶輪社資深會員、中德文化經濟協會理事長、中華戰略學會創辦人，並曾先後被推舉為二任理事長，及中華民國足球協會理事長。又不斷從事研究與寫作，先後完成軍制基本原理（已譯日、韓文）、國家戰略概說、大戰略概說、國防體制概論、臺灣在世局中的戰略價值（被列入美國國會紀錄）、蔣委員長如何戰勝日本及中道與人性等論著二十餘種，部分已譯成數種外文。

兒子孝順老懷彌慰

蔣緯國於一九四五年在西安與石靜宜結婚，感情彌篤，一九五三年石靜宜不幸病逝，使他心情無比創痛，生活也受影響。於鯨居四年後始於一九五七年與丘如雪重續鸞膠。五年後生一虎子，由祖父蔣中正取名孝剛。一九八一年在美完成初、高中學業，一九八五年夏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法律學系，並考取美國紐約州律師執照，之後再獲得劍橋法學碩士。於一九八七年八月與旅美華裔王倚惠（北平籍，獲紐約大學商管系碩士）回臺完婚。王倚惠端莊淑慧，深具中國婦女傳統美德，與西洋之活潑開朗，蔣緯國喜慰不已。

一九九二年五月八日孝剛先獲一女，一九九四年四月三日耶穌復活節復獲一子。蔣緯國含飴弄孫，自謂一生馳騁疆場，晚年乃得一門慈孝之樂，都是祖德福蔭所致。蔣緯國的病史自一九九三年開始，是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清晨，自腳趾以上以至下半身，忽然失去知覺，經臺北榮民總醫院診斷，確定為剝離性主動脈夾層瘤破裂，且腎臟已發生缺血性梗塞，遂進行緊急手術，中間曾經痊癒，惟仍須洗腎，並作漸進式復健運動。他自稱病前一無徵兆，實因憂心國事家事，使偏高之血壓加劇所致。他衰病拖延至一九九六年九月病情加劇，竟於九月二十二日以八十二高齡溘逝。（池蘭森撰）

羅揚鞭 (一九一五—一九七四)

金門防衛部副司令官

政治作戰學校校長

台灣省警務處處長兼台北市警察局長

憲兵司令

羅揚鞭，字奇峯，湖南邵陽人，羅家世居邵陽縣之東鄉朱家冲，忠孝傳家，耕讀爲業。父親羅廣生老人，天性敦厚，富正義感，膺選縣參議員。伯父羅藩瀛，畢業保定軍校三期，曾任國軍第十六師師長，湖南寶永師管區司令，官拜陸軍中將，曾膺選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六叔羅園仙，畢業軍需學校，歷任經理要職暨安徽省企業公司總經理。八叔羅鵬瀛，畢業中央軍校六期，歷任師長、副軍長、指揮官，一門鼎盛，武達文通，在里固爲望族，於國則忠貞世家也。

羅揚鞭於一九一五年十月十四日出生於湖南邵陽，序居長，有三弟二妹，母公田太夫人於家鄉陷共後，慘遭迫害，羅揚鞭之父於一九五一年奉挈幼弟羅雨林逃離大陸來臺就養，因悲憤過度，於一九五四年冬，病逝嘉義。伯父羅藩瀛，在大陸早故。八叔羅鵬瀛亦於一九七三年春病逝臺北。弟羅雨林畢業東吳大學，曾任華南銀行科長。其餘伯叔兄弟姊妹咸受高等教育，各能自立。羅揚鞭於一九三四年夏畢業長沙妙高峯中學後，考入陸軍官校十一期，在校加入中國國民黨，

誓爲實現三民主義而犧牲奮鬥，學成分發，由排長薦任至連營長。一九三九年鄂北戰役，暨一九四〇年隨軍戰役，與日寇浴血奮戰，迭建殊功。一九四三年畢業陸軍大學十八期，分發陸軍廿六集團軍總部任作戰科長，深得總司令周品將軍器重。一九四五年春，擢升第七十五軍第六師第十六團上校團長，一九四七年十月升任第六師參謀長，先後參加抗戰後期之宜昌攻勢作戰暨抗戰勝利之警備、綏靖諸戰役，轉戰鄂、豫、冀、魯各省，先後收復淮陽、鄆城、濮陽、泰安，並進兵沂蒙山區厥功至偉。

一九四八年二月調升第六綏靖區司令部第三處少將處長，兼代副參謀長，一九四九年春轉任浙江警備總部副參謀長兼代參謀長，暨浙江省保安第三旅旅長，仍保留第六師副師長本職。是年五月初，杭州陷共，隨軍轉進舟山，乃回第六師專任副師長職。七月奉調來臺，升任第九十六師師長。一九五二年五月國軍整編，九十六師與六十四師合編爲四十六師，改任該師師長。一九五三年七月，將軍率部駐守浙海之大陳列島，全力鞏固防務，培養戰力。一九五五年春，中共攻陷一江山而不敢輕犯大陳，致其後全師卒能渡海而歸者，實羅揚鞭指揮籌策之功也。

當羅揚鞭戍守大陳時，曾奉調國防大學受訓，適值共軍進犯大陳頭門島。羅揚鞭不忍於國家危急之秋，置多年袍澤及前線要地於不顧，乃毅然自請仍駐防地效命，仰蒙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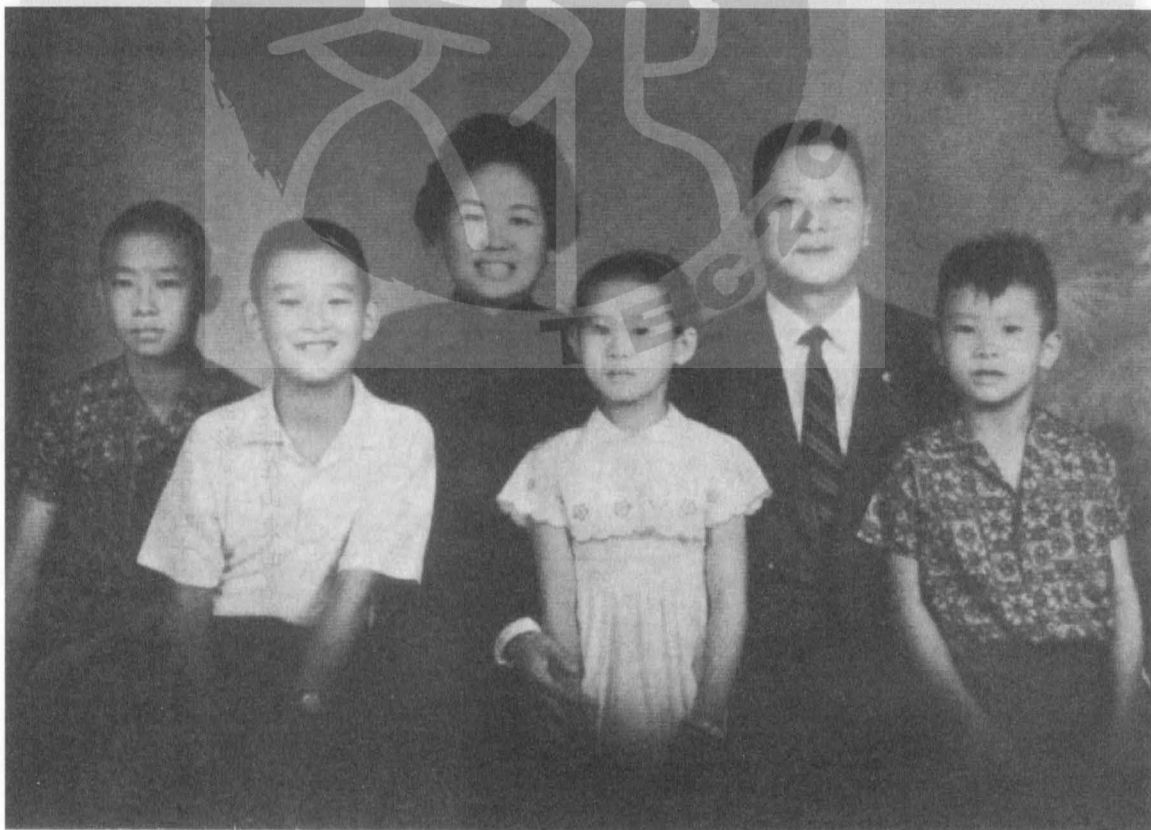
峯核准，得與官兵同生死，共患難，致軍心爲之一振。迨大陳局勢穩定，始遵命返臺，然因開課已久，未便中途加入，仰蒙總統蔣中正特准入石牌聯戰班二期受訓。結訓後，復蒙總統手令再入國防大學四期深造，畢業後，派任臺東師管區司令兼臺灣東部守備司令。一九五七年調升第二軍副軍長，復奉調預備部隊訓練司令部參謀長，在職四年，深獲倚重。一九六一年春，調升第九軍軍長，是年冬，調任第一軍軍長，晉升中將。一九六二年入國防研究院第二期受訓與麻清江、李懷民、戴仲玉、夏季平、趙聚鈺、樂幹、董文琦、蔣堅忍、黃鎮球、羅奇、黃珍吾、劉廉一、潘鎮球、毛松年、張希哲、王多年、胡一貫、張國英、薛毓麒、李參育、鄧爲仁、周宏濤、王任遠等爲同期同學，羅氏品德學問極爲同學所稱道，受訓成績特優。一九六三年秋，調任第二軍團副司令，一九六六年九月，調任金門防衛司令部副司令官，僅二月，旋調政治作戰學校校長。羅揚鞭曾言：「贊字弦歌，英才琢育，雖感責任繁重，而樂亦在其中也。」一九六八年調任臺灣省警務處處長兼臺北市警察局長，於社會治安及警政革新，諸多獻替。

一九七二年七月，奉調憲兵司令，嘗勉部屬：「要絲絲扣牢，步步踏實。」於憲兵數十年成規制度，更循序推動，不遺餘力，一年又七閱月以還，無論政治教育，調查工作，勤務訓練以及後勤裝備等方面，均能在

既有基礎上力求革新進步，其於憲兵之人事處理，更力求公平，公正，功過分明，用能上下一心，圓滿達成任務。而羅揚鞭對「照顧老幹部，培養新幹部」及「規劃建立憲兵基層幹部之紮根工作」等項，尤煞費苦心。

一九七四年元月廿六日下午一時廿分，羅揚鞭因心臟病猝發，送三軍總醫院急救罔效，不幸於是日下午五時卅分與世長辭，享年五十有九，將星遽殞，遐邇同悲！

德配譚夫人淑文女士，湖南省慈利人，系出名門，畢業於抗戰時遷藍田之國立師範學院中文系，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二日於江蘇淮陰軍次來歸，相敬如賓，雞鳴戒旦，來臺後，曾任教嘉義中學、嘉義師範暨建國中學、臺北工專，二十六年來患難相共，伉儷情深，相夫教子，賢淑過人。所育三子一女，長子羅唯仁，畢業國立臺灣大學；次子羅唯義，畢業於臺灣大學；幼子羅唯禮，臺灣大學畢業；女兒羅唯靜，輔仁大學畢業。均能克家繼志，足慰羅氏在天之靈。羅揚鞭畢生獻身革命，誠以待人，慎以治事，嚴以律己，忠以報國，歷剿共、抗戰、戡亂各役，百戰功高，不矜不伐，善處艱危之境，能應非常之變，歷萬險而行堅，臨大節而志不奪。其立身處世，尤深切體認領袖訓示，惕勵奮發，用能宏著勳猷。先後榮獲政府頒給勳獎章二十餘座，誠黨國之干城，軍人之模範。緬懷前徽，實有不能已於言者，謹述其行誼崖略，彰潛德而發幽光！（陳應彭撰）



羅揚鞭夫婦（右二、右四）結婚十五週年與兒女合影。